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成果介绍

资助类别：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项目名称： 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制度研究

项目批准号： 71833002

负 责 人： 吕 炜

一、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本项目就国家治理视角下中国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力求构建适合中国未来发展需要的、满足“两个一百年”目标要求的、针对中国公共服务现实问题的一套理论与实践体系。通过将中国经济社会的典型特征和实际背景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有助于构建适合于中国自身国情的公共服务供给理论框架,以期对财政与公共服务领域研究形成突破。基于项目的逻辑框架和研究设计,本项目的研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基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为深刻认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优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公共服务在此过程中承担的历史职责,梳理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线索,明确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探究国家治理视角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作用和定位。

二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理解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更能够凸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是观察这条独特道路、考察这一形成过程的重要视角。本项目的系列成果立足于财政学话语体系,从体制变革和国家发展角度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概念加以认知。

三是分析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问题并评估公共服务绩效。结合政府的财力和履职要求,研究“两个一百年”目标下中国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分析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政策的福利效应和成本约束。讨论在既定最优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基础上,如何更有效率地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四是立足于国家治理框架研究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机制。在对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创新路径,讨论不同财力状况下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决策机制。

五是在国家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设计现代财政制度优化路径。作为项目研究落脚点,本项目第五部分基于前述研究,系统梳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现代财政制度的建设方向与优化路径,为国家治理体系下公共服务体制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二、项目成果总体情况

项目所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丰富的学术论文成果。自2019年至今,项目组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财贸经济》《经济学家》《财政研究》等国内高水平期刊发表论

文 34 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 14 篇；4 项决策咨询报告得到批示或刊用。

二是加强了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研究期间，负责人先后前往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进行主旨演讲与交流研讨，多次邀请国内外优秀学者前来交流讨论，进一步加强了与财政学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三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人才。项目组成员获得国家级称号以及多项省部级荣誉；指导数十名研究生，博士毕业共 11 人，硕士毕业共 12 人，部分博士生毕业后任职于国内高校，继续从事财政领域学术研究；另有在读博士研究生 17 人，在读硕士研究生 3 人。

三、代表性论文成果介绍

第一，基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中国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

(1) 发表于《经济研究》2019 年第 9 期的《财政在中国改革发展中的贡献——探寻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一文，以 40 年改革实践的特殊过程为基础，系统梳理了财政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内在逻辑关系。文章将财政在改革发展进程中所承担的职责概括为一个根本任务和两项特殊职能。一个根本任务是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指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始终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的国家战略，这是由财政的基本属性所决定的，是财政改革最为本质的实践逻辑，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财政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两项特殊职能，一是保障国家稳定，指财政为改革承担成本的保障性职能，即通过财政兜底方式为改革扫除阻力、创造条件，提供基础性保障；二是提供发展动力，指财政为改革发展提供基础性动力的激励性职能，即通过激励相容的央地关系设计，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预留了可供竞争的激励空间，并对过度激励实施了有效的约束。总体来看，这篇文章的逻辑归结有助于进一步阐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和财政关系的实践形态，有助于客观评价 40 年财政改革绩效、展望未来财政改革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观的继承与发展，是构建契合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财政理论基础的有益探索。（该文章被《社会科学文摘》2019 年第 11 期转载。）

(2) 发表于《管理世界》2019 年第 9 期的《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 70 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一文，通过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的研究框架，观察和分析了新中国 70 年财政实践与理论发展中的特殊性和创新价值，文章发现，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在适应不同发展阶段和体制要求的过程中，始终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战略。未来财政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体制设计和政策安排，以更好地服务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的历史主线，抓住和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为目标，全面发挥财政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主参与、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和生态保护的保障性功能；二是坚持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功能定位和维护中央政府权威的实践逻辑，抓住和围绕体制机制改革这个财政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立足探索试验式治理向顶层设计式治理转换的实践要求，采取更大力度、更具突破性的改革措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三是坚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央地财政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逐渐谋划更加规范的政府间财政体制和政府的职能和作用，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引导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并使这种竞争有利于改革与发展；四是坚持财政理论建设必须尊重历史和反映实践的基本逻辑，财政理论建设和探索必须贴近和解释中国的实践道路和问题，既要体现对现实问题的反馈和指导，也要思考财政的历史和未来，在讲好中国财政故事的同时，探索更具普遍意义的财政理论的创新。

(3) 发表于《财贸经济》2019年第2期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中国财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建设的再认识》一文，在总结40年财政改革实践的经验、逻辑和特征的基础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本质、功能和规律进行了深化认识和理论归纳。文章的基本结论是，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不仅有效发挥了以“政”领“财”，为实现国家改革战略提供根本保障的基础作用，而且积极履行因“财”施“政”，根据改革需求优化财政结构，提升财政效率，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未来若想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财政的根本定位和改革实践要求、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支撑作用，需要从方法论层面上形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践经验规律的认识深化，准确把握新时代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对财政建设发展提出的新定位、新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加快建设现代财政制度的系统认知和知识形态。具体地，一是在根本立场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价值取向；二是在核心问题上必须始终明确财政研究的中国问题意识；三是在实践取向上必须始终围绕新时代财政建设发展的实践过程；四是在研究方法上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方法。

(4) 发表于《财政研究》2020年第11期的《理解中国改革：一种财政的视角和方法》一文认为，理解和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本质内涵和实践经验是新时代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重要问题，从40年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发现，财政在改革历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制度性和保障性作用，为探索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理论解释和逻辑框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制度分析方法。财政研究作为从一个重要视角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分析方法，可能具备进行理论研

究的三个相对优势：一是财政能够反映我国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两种体制转换过渡阶段的历史发展特征。二是财政包含正式制度过程和非正式制度过程的演进，从而能够体现改革过程所呈现的“包容性”制度设计和渐进演进特征。三是财政构成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反映出改革过程中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持续发展、不断完善的目标和历史特征。扎根于中国改革实践、在改革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财政研究，可能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做出贡献。

(5) 发表于《财政研究》2022年第9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领域改革成就、内在逻辑与未来展望》一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始终服务于国家整体改革需要并取得了诸多重要成就。文章系统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领域的重要贡献与成就，并试图在总结国家整体改革思路的基础上，提炼财政改革逻辑。文章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整体改革呈现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始终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并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财政改革逻辑与国家整体改革的逻辑相一致，表现为财政始终以大国治理为战略高度、以国家需求为根本遵循、以人民利益为最终依归。对国家及财政改革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进行提炼，有助于为下一阶段甚至更长时期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方向性指引。

(6) 发表于《财政研究》2022年第1期的《财政与共同富裕：实践历程、逻辑归结与改革路径》一文在系统梳理建党以来革命战争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市场化改革时期、新时代四个阶段财政工作和共同富裕历程的基础上，将财政与共同富裕实践逻辑归结为以下几点：在政治层面，共同富裕是党执政为民的政治基础，财政是以人民为中心推动国家治理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在经济层面，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支撑；在人类文明层面，共同富裕为解决贫富差距这一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方案，中国财政彰显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制度优越性。为进一步推进共同富裕进程，财政应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背景，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建立并完善现代财政制度和政策体系。

(7) 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5期的《中国税制改革的逻辑——兼论新一轮税制改革方向设计》一文，以中国近年来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现实背景和内在根源为思考起点，试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税制调整的产生背景、职能定位及政策用意，由此提炼与归结中国税制改革的逻辑机理和优化空间，并对新一轮财税改革提供方向指引。通过对税制改革历史进程的梳理，文章发现，各阶段税制改革均产生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内生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并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契机，这决定了中国税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在充分明确

中国税制局限性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应注重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地方税体系重构、加强减税降费等政策的短期应对能力，同时应更加重视配套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以更快更好推进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8) 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2022年第11期的《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体系研究——历史形成、理论框架与现实困境》一文指出，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显著优势，它通过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从而在较短时期内实现发展目标。党和国家将这一制度优势聚焦到财政领域，经过不同时期的治国理财探索逐渐形成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体系。从可能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困境来看，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体系的新探索应思考如何兼顾中央科学决策与地方有效实施、如何协调政府宏观部署与市场微观秩序和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问题。未来应从推进政策体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增强政策体系内各环节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和打造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等方面完善集中财力办大事财政政策体系。

第二，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理解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定位。

(1)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1期的《从财政视角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文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命题的提出和发展，既是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和实践的客观总结，也是对世界现代化一般进程在当代中国独特实现形式的精当刻画。以财政为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内涵，在剖析财政、国家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通过“财政与改革”和“财政与发展”两条关键线索，深入剖析中央政府顶层设计下财政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形成的独特作用，有助于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有价值，并可能为丰富和发展世界现代化道路提供来一定的经验和启示。

(2) 发表于《管理世界》2021年第5期的《财政、国家与政党：建党百年视野下的中国财政》一文，试图从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视野出发，按照财政、国家与政党的逻辑分析框架，通过对财政与国家共时性关系的历时性梳理，阐释政党影响和决定下的财政建设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互为促动的制度机理。进而立足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与国家建设实践，阐释财政与市场经济以及财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间内在逻辑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探讨和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独特道路所决定的财政本质与改革逻辑。最后立足中国财政的本质和逻辑，总结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中的独特贡献，为认识和构建新时代中国自己的财政基础理论做探索性思考。

(3)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3-03-21第13版的《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

应的现代财政制度》一文指出，紧扣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推动财政制度优化和机制创新，健全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制度，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坚持完善公共服务供给的财政保障机制，发挥财政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作用，完善面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财政政策，构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财税政策体系，增强财政在提高综合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4) 发表于《财政研究》2023年第3期的《中国式现代化与人民财政》一文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作用以国家认同的形成作为前提，即国家认同涉及现代化国家建设本身，是现代化国家重要的政治资源。财政能够有效解决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利益协调问题，推动形成解决社会矛盾的公平保障机制。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人民财政以其平等、共享的价值理念塑造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认同。从内在逻辑来看，人民财政“以人民为中心”、“让权利约束权力”和“维护公平正义”的特质符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本逻辑、制度逻辑与平等逻辑。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应坚持财政人民性，为现代化国家建设提供发展动力；加强财政法治化，为现代化国家建设夯实制度保障；维护财政公平性，为现代化国家建设巩固社会基础。

(5) 发表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3期的《灵活与稳定、传承与包容——建党百年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与治理逻辑》一文指出，财政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工具，在实践层面总结党领导财政工作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层面阐述党领导财政治理的逻辑规律，不仅使得财政体制的完善具备了现实的路径，同时也为思考党执政历史经验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方法论视角。不同于西方国家一般化模型的理论进路与实践表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财政实践与改革逻辑具备独特的模式和特征：在价值导向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决定共和国财政是人民财政；在执政模式方面，宽容指导方针下的特色央地互动以及重视多方协作共同塑造出财政包容性；在决策体系方面，灵活多变的决策风格和临时创新的政治韧性形成应对危机时的财政灵活性。因此，理解中国财政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制度特色与实践特征，以实现一般与特殊、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统一。

(6) 发表于《中国财政》2021年第14期的《建党百年历史场景中的我国财政建设》一文，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宏大历史场景下的财政建设、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提出财政建设的政治基石是服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财政建设的历史主题是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财政建设的时代变革是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财政建设的重大使命是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总体来看，该文章有助

于从根本上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的政治本质，以及财政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7) 发表于《理论导报》2021年第7期的《创造“两大奇迹”的成功密码》一文认为，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是全面的，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正是这些优势的全面形成和坚持发挥，使我们党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这些优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力量，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法宝，是党带领人民创造“两大奇迹”的成功密码。

(8)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02-14的《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认识》一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已有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一是在认识上不断深化，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二是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三是在战略上不断完善，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战略支撑。四是在实践上不断丰富，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9) 发表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一文认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应统筹好短期策略与长期战略、把握好防范风险的各项原则、做好全方位和多领域的战略工作。就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而言，它将重塑现代化世界版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方案选择，塑造共融共生的文明新秩序，从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展望第二个百年，党将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以更大的勇气、定力和决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10) 发表于《地方财政研究》2022年第8期的《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重要论述：鲜明特质、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一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重要论述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引领我国财政工作的重要行动指南，推动财政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从鲜明特质来看，这些论述强调人民性与国家性相融合的理论立场、发展与安全相统一的理论思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方法。从理论内涵来看，在财政分配上要求处理好发展

经济和保障民生的关系，在财政改革上要求构建着眼长远的现代财政制度，在财政管理上要求强化政府对财政的宏观调控和约束力，在财政政策上要求真正发挥财政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在区域财政上要主动破解区域发展困境。从实践经验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政实力不断壮大、财政体系逐步完善、财政职能持续增强、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面对技术冲击、收支压力、改革难点、政策协调等困难和挑战，财政应坚持目标和问题导向，强化系统观念，抓好政策落实。

第三，分析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与质量问题并评估公共服务绩效。

(1) 发表于《光明日报》2020年6月9日第11版的《加强财政对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的支撑作用》一文指出，进入新时代，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现代化是推进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基于此，在国家治理视阈下，财政制度建设一方面要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治理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自身的体制机制，为公共卫生、社保、救助、就业、脱贫、教育等公共服务关键领域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率的财政支持。根据上述要求，财政制度建设必须有助于深化公共卫生服务供给体系改革，提升基本医疗和卫生防疫能力；必须有助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与救助服务供给体系，提升安全风险兜底保障能力；必须有助于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供给体系，提升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必须有助于发挥对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撑作用；必须有助于完善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公共教育服务供给体系。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财政制度建设需要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通过深化税收制度、预算制度、央地关系、财政治理模式等领域改革，有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全面支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供给能力现代化。（该文章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学习强国”平台等媒体全文转载。）

(2) 项目组成员在《经济研究》2021年第9期发表的《看不见的家庭教育投资：子女升学压力与母亲收入损失》一文也得到了本项目资助。该文章利用子女升学压力对家庭教育重视程度的外生冲击作为识别框架，估计了母亲由于子女教育压力而放弃的潜在收入，为识别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月收入显著下降19%，同时父亲收入没有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发现，高学历、非国有行业、育有男孩或独生子女的母亲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学压力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在子女升学压力下母亲会通过降低劳动参与率、降低工作时长以及增加家庭照料时间等方式进行隐性教育投资。进一步利用地区重点高校录取率反映地区升学压力，发现子女升学压力越大的地区，母亲收入下降幅度越大。本文研究识别了子女升学压力下的家庭隐性教育投资行为，为更好理解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和家庭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

观察视角。

(3) 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2期的《教育机会公平与居民社会信任：城市教育代际流动的实证测度与微观证据》一文，构建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教育代际流动指标，测度了中国城市层面的教育代际公平，并将其与城市宏观数据和微观个人数据匹配，研究了城市教育机会公平对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文章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教育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公共产品，政府应当为每一位居民提供大致相同的教育发展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同时，文章还认为，未来教育政策应精准聚焦于城市低收入和农村群体，为其子代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公平的教育机会，进而有效消除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4) 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9年第11期的《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及微观影响的实证测度》一文，利用回归残差性质构造了标准化个体的满意度得分，计算了城市内部个体间标准化满意度的变异系数以测度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并使用有序 Probit 和 OLS 估计方法研究了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微观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间的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呈现显著差异，城市内部均等化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提升社会信任水平，同时这种影响在个体间存在异质性。该文章的结论有利于更好呈现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及其微观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能够为相关政府决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依托研究结论，文章得到的政策启示如下：一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需要关注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推进城市内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多应当强调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在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既定的情况下，更加精准地满足个性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实现居民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从支出均等化、服务均等化向满意度均等化转变，考虑不同群体的真实公共服务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居民切实需求的公共服务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差异化群体的公共服务需求，最终实现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大致均等；三是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涉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公平问题，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推进城市内部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成为政府化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工作方向。

(5) 发表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年第4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生发展评估实证》一文，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在倡议提出前后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变化，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人类发展指数三个分项指标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对沿线国家的教育指数提升显著；相应的机制与异质性分析结果也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改善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

促进了沿线国家在教育、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这些因素最后都落实到人类发展指数的提升上。该文章从民生角度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提升给出了实证评估结果，与现有的针对“一带一路”倡议贸易效应、投资效应的研究形成互补；站在非“我”立场，针对沿线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进行检验，更能全面地认识“一带一路”倡议。

(6) 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9期的《教育供给方式与教育满意度——基于入学方式的考察》一文，从入学方式的角度研究了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实证结果表明，与其他入学方式相比，子女入学方式为就近入学的家长教育满意度更高。分组检验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入学方式对家长教育满意度的影响还因子女入学阶段、学校类型、城乡之间存在差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入学方式的不同可能会通过影响子女上学路上所花时间、睡眠时间、家长与子女的相处状况、家庭福利状况等途径影响家长教育满意度。本研究将为我国政府制定和评价教育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参考：其一，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目的是要改善民生，政府在制定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时，不仅要在供给侧发力，还应从公共服务需求侧考虑公共服务接受者的诉求；其二，政府在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时候，不仅要考虑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更要重视供给的方式；其三，政府在进行教育投入时应尽量做到均衡，向教育资源匮乏的地区及学校加大倾斜力度，在分配教育资源时合理规划学区，尽可能做到各地区教育资源配置大致均衡；其四，单纯增加教育公共服务支出可能会出现供给过度、投入—产出效率低下的情况，但并不等于就要减少供给，而应该找出问题原因之所在，不断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第四，立足于国家治理框架研究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机制。

(1)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的《中国的包容性财政体制——基于非规范性收入的考察》一文基于地方自主财力长期依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特征事实，建立了一个包含中央和地方双重行为视角的包容性财政体制分析框架，用以阐释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以非规范性收入为载体的隐性分权合约，刻画在中央财政容忍和地方财政自主的行为动机下中央和地方财政互动的制度空间和动态过程，阐明非规范性收入、中央和地方激励相容与经济增长及市场化改革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在包容性财政体制分析框架下，普遍内生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非规范性收入，不仅弥补了正式预算制度下地方事权、支出责任与财力间的不适应，而且在保障体制平稳运行的同时实现了地方行为与经济增长目标的激励相容。

(2)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的《理解央地财政博弈的新视角——来自地方债发还方式改革的证据》一文,立足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背景,强调了持续渐进制度变革过程中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作用,尝试从“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制度变革逐步实现”的角度为研究央地财政博弈提供一个完整而崭新的视角。文章通过对地方债发还方式改革的具体解剖,提出了改革过程中央地财政博弈的逻辑:为更好调动地方政府推进改革、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中央政府需要通过对其赋权来达到激励效果,并在一定时期内对地方政府的不规范行为采取一定的包容性态度,提供一定的弹性制度空间,使地方政府有较高的积极性实施创新;但一旦观测到地方政府行为可能滋生出影响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风险隐患,中央政府必然会及时调整赋权方式,以确保市场化改革进程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行。文章由此进一步提出,未来中央政府的财政制度设计不仅要为地方政府留出一定的自主权利和弹性空间,以充分调动地方资源、激发市场活力,更要注重加强中央顶层设计和整体驾驭能力,这样才能跳出体制改革“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真正实现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3) 项目组成员在《经济研究》2020年第8期发表的《减税激励与企业债务负担——来自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的证据》一文也得到了本项目资助。该文章利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基于小微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带来的冲击,使用群聚(bunching)方法考察了减税激励对小微企业债务规模和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减税政策显著降低了小微企业税收负担,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为国家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减税政策提供了经验支持。

(4) 发表于《经济学(季刊)》2022年第2期的《税收努力与官员个人效应》一文,利用1999—2007年我国地方政府财政和官员变迁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官员个人效应对税收努力的影响。文章发现地方官员个人效应能够显著影响税收努力程度,而出于税权配置、征收策略等原因,其对地方税税收努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共享税和中央税税收努力则影响较小,甚至有负向影响。文章重新审视了税收实践中“人的因素”,并建议引入更合理的激励机制,既充分发挥地方官员的积极影响,也防止官员个人过度影响地方财政和经济运行。

(5)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0年3月31日第9版的《不断完善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的财政关系》一文指出,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通过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建设,既为地方政府推动发展提供制度激励,又保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这些制度建设的特征和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激励地方发展和保证中央权威是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的重要特色。其二,根据经济体制改革不同阶段的要求对中央和地方关系进行动态

调整。其三，同步推进中央向地方下放财权与政府向市场放权。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为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风险挑战、对冲经济下行压力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未来应继续加快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释放发展新动能、增强发展新动力提供制度激励和保障。（该文章被“学习强国”平台、求是网以及《理论导报》2020年第4期转载。）

（6）发表于《财贸经济》2022年第7期的《税制结构调整的财富分布效应与福利影响——以通过财产税提高直接税比重为例》一文，构建了一个异质性连续时间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在保持宏观税负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探讨了间接税比重下降、财产税比重上升的税制结构调整对财富分布和福利的影响，并比较分析了财产税的不同征收形式以及税率调整的不同方式导致的政策效果差异。研究表明，当财产税征收面较大时，若通过同等程度增加不同个体税率来提高财产税比重，均可能导致公平和效率的双重损失；在财产税比重较低时，可以在均匀税率下通过仅对高财富人群征税从而以极小的福利损失带来较大的财富不平等程度的改善，而采用累进性财产税税率形式甚至可能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双重红利；当财产税比重达到一定程度后，继续提高该比重通常会面临公平和效率的尖锐权衡。因此，中国未来可以通过对高财富人群开征适当形式的财产税，以提高直接税比重来实现税制结构优化。

（7）发表于《经济学家》2023年第3期的《减税降费与地方债务风险：基于城投债的证据》一文，利用2007—2018年地级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呈现“U”型非线性关系，即减税降费力度低于平衡点时，减税降费能够抑制城投债规模的扩张，但当减税降费力度高于平衡点时，继续实施减税降费会导致城投债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地方财政压力处于中低水平以及金融风险等级低的城市，财政承受能力更强，减税降费与城投债之间“U”型关系的平衡点偏低，减税降费抑制城投债规模扩张的持续时间更长。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优化我国减税降费政策、降低地方债务风险、提高财政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8）发表于《经济学家》2020年第11期的《转移支付、税制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77个地级市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文立足于中国式分权这一典型化事实，将转移支付、税制结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同一理论框架，系统诠释转移支付与税制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其次，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均等赋权相结合的方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体系，全面测度我国地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随后，通过建立动态面板联立方程模型与采取三阶段最小

二乘实证考察转移支付与税制结构对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发现转移支付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税制结构变迁均存在负向抑制效应,而直接税占比提高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上研究结论不仅为构建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提供参考,还有助于揭示财税制度安排影响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

(9) 发表于《财经研究》2023年第5期的《社保费征收事权归属、信息共享与响应效率》一文,基于《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利用2007—2013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比较了社保全责模式与税务代征模式响应效率的差异。文章研究发现,社保全责模式对《社会保险法》的响应效率显著优于税务代征模式,社保部门响应效率的提升主要表现在私营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反映了法律的扩围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信息化交流,可以有效弥补税务代征模式的响应效率。文章的研究表明,在税务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征收事权的背景下,应提升税务部门在征收事权上的主体责任,加强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间信息化交流水平的建设,文章的研究也为推进社保费征收事权划转改革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10) 发表于《中国科学基金》2021年第3期的《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与经济发展模式》一文,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与学术需求,分析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研究的现实背景及其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政府间财政关系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发现现有研究从不同角度较好地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内在动力机制,对中国特色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现有研究在阐释改革进程中诸多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等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由此,该文章提出未来有待进一步关注和探究的关键科学问题,以期为该学术领域提供契合现实的研究思路。

(11) 发表于《财经问题研究》2023年第9期的《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的影响及机制研究》一文,以2007—2013年全国税收统计调查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的影响及机制。基准分析结果表明,税收任务对企业社保遵从具有负向影响,且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税收任务导致的企业策略性降低社保遵从主要表现在非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非重点税源企业,反映了社保费征管部门针对不同类型的差异化征管强度;另一方面,降低税务任务的完成难度和采取税务全责的社保费征收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过高的税收任务增加了企业税负,企业为了缓解税负增加带来的现金流压力,策略性地选择降低社保遵从,表现为税费替代的跷跷板效应。本文的研究为客观评价税收任务与企业社保遵从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经

验证据，即应该高度重视过重的税收任务对企业税费征缴造成的微观影响，优化税收任务的制定流程与强度设置，提高税务部门在社保费征管上的主体责任意识，从而进一步缓解企业税费替代问题。

第五，在国家治理与高质量发展视域下设计现代财政制度优化路径。

(1)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2-02-09 第 7 版的《守正创新推进新时代财政理论建设》一文指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对财政工作的领导，推动财政工作服务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积累了成功开展财政建设的宝贵经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积极推进新时代财政理论建设，为充分发挥财政在治国安邦中的基础性、制度性、保障性作用提供理论支撑。

(2)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1 年 5 月 21 日第 13 版的《让财政在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一文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财政的支撑和保障，需要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让财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要提升财政资源配置质量和效率，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动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实施。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变化不断优化和完善宏观调控措施，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并在多方联动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财政还应发挥促进共同富裕、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作用，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举措，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3)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0 年 7 月 17 日第 9 版的《更好发挥财政保基层运转的作用》一文认为，保障基层正常运转离不开财政支持，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更好发挥财政在保基层运转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一，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统筹使用财政资金，为基层运转提供有力的财政支持、发挥更强的兜底保障作用。第二，优化支出结构，加快转移支付资金的向下分配、拨付和使用；同时，基层机构也需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进一步压减一般性支出和非急需、非刚性支出，提高基层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第三，保基层运转要加快完善县级为主、省级兜底的责任体系：县级财政需要全面落实保障责任，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工资发放和机构运转；省级财政需要切实承担主体责任，做好省以下财力统筹安排、均衡调节。第四，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使基层运转更加优化、更有活力。

(4) 发表于《人民日报》2020 年 10 月 9 日第 9 版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文指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这要求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根本立场，并在改革开放 40 多年伟大实践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新，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该文章被人民网、新华网、光明网、央广网、央视网、中国新闻网、海外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中国网、党建网、中国教育网、中国青年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官网等网站、“人民日报理论”等公众号、《南方论刊》2020 年第 10 期先后进行转载。)

(5) 发表于《光明日报》2023-06-06 第 11 版的《完善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财政政策》一文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科学把握人口发展规律，深刻理解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兼顾多重目标统筹政策安排，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质量人口支撑。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离不开财政政策的支持，应合理把握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节奏、力度，充分发挥财政政策支持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实现可持续的人口发展，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6) 发表于《光明日报》2022-08-10 第 6 版的《推进政策创新 促进高质量发展》一文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政策创新，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时处理好完整、准确、全面的关系，在统筹全局性政策时处理好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关系，在谋划结构性政策时处理好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关系，在把握政策时度效方面处理好发展质量和发展速度的关系，在协调宏观政策方面处理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

(7) 发表于《光明日报》2021 年 5 月 21 日第 11 版的《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属性和建设方向》一文指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需着重于以下几个主要方向：第一，坚持党对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全面领导，这是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第二，坚持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框架内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第三，加快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财政体制机制；第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功能。

(8) 发表于《经济日报》2023-07-12 的《深刻领悟战略问题是根本性问题》一文认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深刻理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紧密联系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和新的战略环境，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

(9) 发表于《经济日报》2021年1月27日第10版的《扭住东北全面振兴的“牛鼻子”》一文指出,只有从根本上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和激发市场活力,才能释放改革成效、提升创新能力和扩大开放合作,进而逐步化解东北地区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扭住“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牛鼻子”,让政府与市场两种力量更好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为补充。东北地区深化市场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是找准突破点和发力点,通过新的战略举措解决好要素市场化、市场主体活力激发、营商环境优化和干事创业风气等问题。

(10) 发表于《管理世界》2022年第6期的《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一文中,以《聚焦中国道路 贡献中国智慧——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的几点思考》为题,探讨了对于中国特色经济理论的理解。构建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系,需要立足于中国特色实践道路,发掘中国特色历史规律。以实践和历史为基本依据,有助于更好总结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与运行逻辑,更好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内在动力,进而指导新时代经济理论发展与经济实践路径。面对新的时代课题,凝心聚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是构建中国经济理论需要围绕的大格局。一是建设中国经济理论需要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要义、实践特征和理论脉络搞清楚。二是建设中国经济理论需要系统总结和完善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三是应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思想的角度思考中国经济理论建设。未来的重要使命是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以更好解释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

(11) 发表于《经济学家》2023年第8期的《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城市创新能力——基于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一文指出,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战略主导地位,通过加强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可以有效带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本文基于2003—2018年间中国289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政策的确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对于策略性创新而言,政策实施后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效果更大,按照承接服务外包不同城市类型和地理位置划分,发现示范城市的认定显著提升了服务型城市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水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发现,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主要通过服务业结构优化、资金投向技术研发以及科技投入增加三种路径实现。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改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期,服务外包不仅是中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城市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引擎。

(12) 发表于《财政研究》2021年第9期的《新时期财政工作的几个重大

关系》一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财政工作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科学认识和处理若干重大关系，以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在完善国家治理和制度体系层面，要处理好财政与党的领导、国家治理，财政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关系；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层面，要处理好财政与改革、发展，财政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层面，要处理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地方债与防风险的关系。

(13) 参加 2020 年 6 月 10 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主办的“支撑‘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中国独创性理论”主题研讨会，并撰写笔谈文章《构建中国经济学笔谈》之《从中国实践到中国独创性理论》，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20 年第 7 期。文章主要观点为：中国独创性经济理论应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实践为依托，更好总结中国经济运行特征与运行规律，更好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与内在动力。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建设应体现三方面特点：一是立足中国特殊经济实践，讲好中国经济故事；二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兼容并蓄；三是形成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而目前中国的经济理论发展略滞后于实践。未来应针对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理论，进而为全世界的经济理论发展做出中国贡献。